

November 2013

Continuation and Construction: On the Edition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Its Limitation

Xiuming Wu

Tao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u, Xiuming, and Tao Zhang. 2013. "Continuation and Construction: On the Edition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Its Limita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6): pp.26-3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6/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赓续与建构:当代文学史版本及修改有限性问题

吴秀明 章 涛

摘要:当代文学史版本研究不但关系到对文学史编纂经验和思想学术成果的清理,同时也对学科建设乃至文学教育、人才培养产生重要的辐射和影响。本文基于此,以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及其编写范式变化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探讨当代文学史版本及修改有限性问题。意在强调和指出:从政治或泛政治向审美、文化范式转换固然是修史的一大突进,但它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纠结与历史局限;仅仅凭藉观念创新是不够的,只有以坚实的史料为支撑,实行观念与史料的参证互渗,才有可能使文学史编写及修改在赓续与建构的学术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 版本修改 历史发展 内在局限 史料问题

作者简介:吴秀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子邮箱:zjuwx180@hotmail.com

章涛,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电子邮箱:eudeimon2010@hotmail.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10AZW00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ontinuation and Construction: On the Edition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Its Limitation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edi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academic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scholastic development. The call for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late 1980s in response to the paradigm shift in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is taken as the dividing line of two periods, and the paper proceed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editions and examine the limitations in the revisions in the two period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hift from the political to aesthetic or cultural perspective is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but it also implicates inner conflicts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which cannot be resolved merely within the boundary of concept innov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only through the support of positiv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cross-evidence between concept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can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and revision make more contribution to academic continua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revision of edi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ternal limitation problem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uthors: Wu Xiuming is a professor in Chinese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Email: Zjuwx180@hotmail.com

Zhang Tao is a Ph. D. student in Chinese Department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eudeimon2010@hotmail.com

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版本研究基本都被锁定在“文学作品”层面,而与“文学史”似乎无缘。这虽然可以理解但毕竟是一个缺憾。其实,当代文学史作为兼融“文艺科学”与“历史科学”双重特性,并被纳入现行大陆高校教育体制带有导向性的一种研究形态,它的版本与修改除通常“文

学作品”的文本校勘、考证外,还兼负清理和考察批评史、学术史、思想史的任务,并不可避免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乃至整体文学教育、人才培养产生辐射和影响,因此有必要值得我们引起重视。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一部文学史的不同版本本身就体现了修史者对作为“专门学科”和“知识

体系”的当代文学的理解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源于文学史观念或编写范式的嬗变,也有可能是史料的发现反过来推动了对原有文学史的修改。但不管是哪种原因,它都是对既往文学历史话语的赓续与对未来文学历史话语的建构,其修改本身就是一种赓续与建构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修史者在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中秉持怎样的立场态度,又对原有的历史叙述作怎样的增删处理,就不仅是个人或某一团队的一种选择,而同时必然也嵌入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文本主要根据1988年“重写文学史”及其编写范式变化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探讨当代文学史版本与修改有限性问题,旨在从版本的角度揭示当代文学内在的动态结构和矛盾纠葛,勾勒和总结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发展轨迹和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提供有益的参照。

为了集中论题,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说明二点:第一,本文所说的当代文学史是指1949年开国起始以迄于今的大陆地区的文学史(这部分包括的文学史数量最多),但也将90年代以后出现的以“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命名而又包含了“当代部分”的文学史,以及相关的文史或专门史也纳入考察的视野。第二,本文所说的当代文学史版本与修改,不同于纯粹作异文考据的传统校勘学(它往往只讲对版本的“通校”),而是将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场”作综合性考察。当代文学史至今已出版80多部,^①真正修改再版的大概占总数四分之一左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未完成”形态版本的不稳定及其质量。当然,这里所说的版本修改主要是指有内容修改的文学史而言,至于个别史实纠错或文字修饰方面修改的版本,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②

一、80年代:

文学与政治矛盾及其弥合的有限性

尽管正式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可追溯到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和同时期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第1册(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部分纲要》,仅供内部教学使用,另当别论),也尽管在80年代初当代文学史编写开始蔚然成风,颇结硕果,但限于本

文的论旨,上述这些情况只能“翻过去”忽略不计。因为从版本学角度考察,60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几乎不可能容许存在“错误”的文学史有再版的机会,它一般以更为激进的批判和重写的方式取代;而80年代初语境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毕竟还是属于“政治中心”的时代。只有到了80年代中后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有较深入的反思,才有可能产生重述文学史的内在动力。郭志刚等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1988年修订版,在这方面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部当时影响较大、连续重印数版的文学史,在过了八年以后的80年代后期,为了“重构”与当时现实的关系,主要就以下三方面对初版作了修改:“一、调整某些过时的提法,使全书在观点和表述方面更加符合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精神;二、注意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提高全书的科学性和理论水平;三、增删和调整某些章节。”^③就如电影《武训传》和胡风文艺思想问题,初版本按照当时流行的结论对之持完全否定批判的态度,修订版则删去了“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站在反共的立场”等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词,改成类似“社论尖锐地指出”、“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美学思想”这样的中性文字描述;而对长期被定性为“主观唯心论”的胡风“主观战斗精神”及其与毛泽东《讲话》之间存在的某些歧义,则采取回避的态度,只强调“胡风是拥护《讲话》并对毛泽东怀着很大的敬意的。[……]他不是一般地重复《讲话》,而是从国统区和解放区不同的历史条件出发,结合着文艺创作上的特殊规律和作家与人民结合的复杂历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8版64)云云。

可见,尽管新旧版本对当时文艺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甚至近乎180度的调整,但其修订实际仍围绕着“政治上正确”这个基点展开。这也是80年代当代文学史叙述必然遭遇的境况。《初稿》责编杨桂欣在一篇文章中曾对此做过说明:“当时,党中央尚未来得及解决,怎么办?是维持原有的结论,还是重新估价?”最终的决定是在“党中央对这些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之际,我们再修正自己的看法,是来得及的”(197)。因此初版中的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而在1988年修订重版时,胡风问题已经比较明朗,于是修订

版便迅速将批判调整为对“历史受难者”的同情。

但问题是,在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当代文学史自身的史料合法性和叙述逻辑几乎被完全淹没。比如在胡风问题中,新旧版本很关键的差异在于初版指认胡风曾“投靠国民党改组派”和转持“反共”立场,但并未给出任何的依据;而在修订版中这个极严重的政治指责被删去,也同样没有在这方面给予交待。再如修订版尽管调整了对批判《武训传》的叙述,但又保留了对这场批判运动的积极评价,认为它“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于肃清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对人们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8版50)。比较两个版本可以发现,修改者只是替换了原来较为偏激和绝对化的用词,基本的意思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此外,在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问题上,80年代文学史的修订也普遍存在着某种纠结:修史者一方面通过历史叙述来展现十七年文学成果,反驳“文革”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证明它在80年代语境下仍能释放现代话语符码的能量;但另一方面,80年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又要求修史者在修订过程中对新时期以来的新文学/政治语境做出回应,因此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对已有十七年文学史的“重审”。88版《初稿》也就是据此,将原来誉为“壮丽史诗”的《红旗谱》降格为“史诗性作品”,将原来侧重从十七年总体性视角切入评价十七年散文,改为在类型细分基础上的艺术分析。而对十七年的经典作品《创业史》的修改幅度则更大:在初版本里,它被誉为“是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的巨著,其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远远超过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版308-09);到了修订版中,则只保留了“《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史诗式巨著,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前半句,后半句评价更高的一段文字悉被删去,梁生宝也不再是体现“作者社会政治思想及美学理想”的“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而是降为“农村新人形象”。

在由政治或泛政治向文学回归这点上,张钟等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以下简称《概观》)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概观》原本就有不同于《初

稿》的独特的编史体例:它大胆去掉了思潮与运动等“外在依附性”结构,而按文类分编用较多篇幅评论当代作家的艺术特色,这在当时是仅见的。1986年的修改版在此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更强烈地表现出了向文学本体转移的倾向。比如同样是对十七年文学反思,初版主要从批判“左倾”思潮出发,而修订版则从文学观念的内在矛盾入手;同样是对新时期文学评价,初版本主要立足于“作家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社会批判的战斗精神”、“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等外在社会性方面因素,而修订版则更多落在文本主题、人学回归、艺术思维等内在审美特质方面。

但这样的修改并不意味着86版《概观》已完成了某种文学史范式的转型,事实上,受历史话语层积的影响,编者上述理念在实践中已程度不同地发生了偏移。有研究者曾对此进行专门分析,将其归结为教材的定位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社会主义制度宣传”功能的想象:“既然是社会宣传,就要按照其宣传口径、意图、方式对文学史框架、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重新‘命名’”(王丽丽157)。故《概观》“尽管在各章节的题目上换上了比较时尚的术语,如‘新时期’、‘探索的道路’、‘苦难历程’和‘跋涉者’等,但许多章节仍保留着过去文学史叙述的‘惯例’。比如,对文学题材,继续沿用‘农村题材’、‘军事题材’、‘工业题材’等政治色彩浓厚的说法;在评价作家的创作时,并没有对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结论进行明显调整;认识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的视角,仍然因袭以前那种陈旧、僵化的尺度和标准”(王丽丽157)。这样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至于修订版将初版有关《风雷》和《艳阳天》的论述全部删去,此举本身也就喻指了在文学与政治一体化机制中,当代文学史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分裂”。

在讲80年代当代文学史修订时,还不能不述及它原有的充满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坚硬的框架,这也是造成不少文学史“重述”有限性的重要原因。就拿朦胧诗这类带有异质色彩的作品来说,因为逸出了“延安—十七年—新时期”文学固有的叙史结构,它在修订时依然被《初稿》所拒绝,不能纳入最后一章“新时期的诗歌创作”中,类似的许多应该修改和补充的问题也只好无奈地推到了将来所谓的“续编”去解决:“鉴于自第四次文代会以来的新时期文学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

展,大家认为,应该编写《初稿》的续编,专门讲述这个时期的文学,另行成册。待有关方面进一步组织、落实编写任务后,即可着手编写该项教材。原来我们设想的对《初稿》进行较大的修订,也主要是考虑应增加新时期文学的篇幅,而这个任务,在《初稿》原来上、下册的框架内是难以实现的”(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8 版修订说明 1)。

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内部修订中。1979 年开始着手编撰时,《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开始对十七年文学史范式(主要是其前身、1962 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进行反思,并思考文学文本在文学史中应该占据的地位,全书顾问冯牧曾在 1982 年的审稿会上明确表示希望看到这本文学史能更靠近文学本身(“关于中国”44-56)。1983 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编目内容的比例安排上,就能看出作家作品比例有明显改观。同时,在表达方式上,《中国当代文学》也比《史稿》要显得更为客观。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当代文学》还是或多或少地沿用了十七年时期的阶级论标准,它对朦胧诗和一些带有批判锋芒的作品,与《史稿》持有惊人相似一致的立场。冯牧这一文学史观虽然在 1986 年第二次审稿会议时发生了一定改变,他开始承认文学多样化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文学“多样化”必须建立在“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人民需求”,能够“起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文学”216)的基础上。因此在第三册编写时,其评价标准就更多了一份犹疑不决:在文学史观念上,它无疑比前两册要更为多元开放,但这种开放又是有限度的。如对朦胧诗,在概述中,它给予较高的评价,但在具体分析时却只让舒婷“出场”^④;又如“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公开的情书》和《波动》等,均列入叙述的范围,但编者对其思想与艺术方面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超越因素”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轨道的偏离”(洪子诚,“中国”183)却保持了沉默。事实上,直到 1999 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版问世,其他朦胧诗人如顾城、江河、杨炼的作品才以正面形象进入这部以“主旋律”意识编写的文学史。有意思的是,修订版对“手抄本”的讨论却出现了“停滞”,编者仍将文本的文学史价值建立于作家创作中表现出的

对“泛滥的法西斯兽性”的抗争性上,而对小说在艺术形式和手法上的探索却视而不见。

总之,80 年代文学史修订的被动之处在于,它始终置于社会政治决定论的叙述结构中难以自拔,正如有人评论《初稿》时说的:“体例明显的仍是以文学的内容去填充革命史的大骨架,并没有能脱去按时期分编章的窠臼。一部当代文学史写成,人们看到的多是建国三十年各种‘史’的共性、共同点,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线索和眉目反而模糊了。这样,作家作品只是和历史结合了,同文学发展史仍是分离的”(湛宗恕 203)。因此他认为现有体例是无法彰显当代文学的独特性,而是“新的模式或八股”,它所抓住的“质变点也是整个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发展的质变点,并非三十年文学发展自身所特有的”(203)。而在这样的结构下,即便是微小的调整也首先需要获得政治的首肯,这使得修订无法达到根本性调整的目的。换句话说,版本修订的有限性是文学史内外多重合力的结果,它的体例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交织的知识型,往往决定了其论述主体的缺失和叙述过程中的矛盾性,且这些问题都无法通过对内容的调整在修订版中得到实质性改观。当然,从另外角度看,它的充满矛盾悖论的修订也为下一步如何进一步重构积累了经验。

二、90 年代:

审美与文化两难及其修正的历史局限性

80 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时提出的“审美”原则,无疑对当时修史观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之后,出版于 80 年代的文学史即使在 90 年代修订再版,也基本失去了其影响力;而 90 年代以来出版的文学史,则大多将 80 年代《初稿》、《概观》等第一次重写时表现出的回归文学本体的倾向进一步放大。然而极具意味的是,口号并不等于行动,当真正将“重写文学史”的理念付诸于实践,修史者却表现出了某种“犹豫不决”。这里困难在于,“审美”原则遭到了文学史自身历史话语的阻碍,无法独自承担关于文学历史的想象;同时,它也会重新遮蔽另一部分重要史料和文学作品入史。这些问题在 90 年代的文学史修订中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暴露。

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

学》,^⑤它在1999年修订时,尽管有意识地调整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标准,努力发掘和肯定《青春之歌》内含的审美元素,但最终还是将它定格在“只有接受党的领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的范畴,并且在字里行间仍对这种政治话语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如认为“曾是‘多情的骑士’的余永泽原来是个自私、平庸”的男人,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决裂“是她思想变化和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是她战胜了自己“缠绵的小资产阶级感情,踏上了革命征程”(王庆生201)的结果——这一切,都使人想起了十七年期间茅盾等人为杨沫辩护的文章。

与99版相比,03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对文学史关注的落脚点出现了位移。仅就绪论而言,前者在反复论证政治与文学的“合理关系”、为文学的自主性寻找意识形态证明的同时,也恰好暴露了其试图“重述文学史”的话语痕迹;而后者则将注意力从“文学是否能够与政治保持距离”转移到了“当代文学学科的确立”上来,新版本的文学史修订也就顺理成章被纳入“二十世纪文学”与“重写文学史”背景中,它必然推进和促使原有政治化叙述逻辑和研究方法的调整。因此编者在重述《青春之歌》时,对小说生产的历史背景和革命意义的叙述只用了很少的篇幅,而是更多落在了作品所蕴含的时代性内涵及其“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巧妙缝合的文本经验上。其研究的视点,不但从“知识分子改造”转向了“女性成长”,而且也更为注重文本内部的深层结构、作家“自我话语”的历史可能性和叙述的策略性。比如对林道静双重血统身份的分析,对表达论者“立场”的小说叙事视角比较平和的分析——这表明编者开始注意对文学历史的客观化叙述,它尽量用事实本身说话,而不是在史书中直接“发声”,抑或以指导性的价值判断代替读者的思考。而后者,恰恰正是80年代初中期及此前出版的一批当代文学史所惯用的叙史模式。

此外,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值得关注。从章节标题上看,其下册有关当代文学部分,初版本至少有五处做过修改,这大致又分两种情况:一种修改是文学史“筛选”的结果,即修史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情况下,认为旧版本中的有些作家作品已不再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而加以剔除,或与其他作

家作品合并或再引入新的作家文学作品,以构成文学史系统的合理更替(如第九章、第十二章的修改)。另一种修改则是编者文学史观“调整”的结果,它由社会政治思潮视角的历史叙述逐渐走向基于文学本体自身规范的文学史表达。如第八章第一节“民族精神振奋和理想主义文学”的修改,在初版本中,编者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对中国人的精神发生极大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论述理想主义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一表述显然没有摆脱“从社会政治到文学文本”的逻辑关系,他对理想主义话语生产及其复杂表征系统的分析也稍显简单。而在新版中,黄修己一改初版时“单刀直入”以建国作为理想主义的“起点”,更多从文学本身的层面探讨它在种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下的嬗变。因此理想主义不再是某种简单依附于民族精神的文学品质,而是与后者共同成为当代文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想主义的“变态”同样也会反过来影响当代文学的表意体系。再如第十三章的修改,初版本尽管将大众文学引入文学史,形成了某种文学史结构的突破,但也仅是简单对小说品种和作家的罗列。而修改版则将阐释的视点深入到审美范式变革,实际上是承认大众文本的“审美价值”,这就构成了对“重写文学史”中稍显狭隘的“审美性”的超越。

不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来看,这种转向文学本体的审美修改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甚至不妨可以质疑。因为审美尽管是构成文学的生命内质,但它毕竟只是文学史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果不加规约地过于夸大,很有可能造成对文学史的另一种简化乃至伤害。也就是说,它对传统“他律”结构下文学历史的重叙,也有可能在转身寻求解决路径时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文学“自律”的限度和能力而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失衡。这种失衡的情况在90年代文学史修订中不难可见。就拿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来说吧,前文已经讲过,该书修订版对文学史理解更多是从文学本身出发,它主要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但问题是,在修改时编者仍保持了初版本中由“现代文学”衍生出来的统化标准化的“美学标准”,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前三十年”的文学经验。比如,初版本叙述当代“前三十年”文学和“后三十年”文学分别为63页、160页,而修订版叙述当代“前三

十年”文学和“后三十年”文学分别为36页、100页。修订后的“20世纪文学史”框架中,当代“前三十年”文学与“后三十年”文学在篇幅和内容上不成正比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这无疑与编者秉持的去政治化的叙史理念有关,它造成了对当代“前三十年”文学的关注偏少且流于简单化、缺乏某种更为深入的历史同情和历史反思。再比如,在62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和83版《中国当代文学》中,都有“群众文艺”或“工人作家的小说”等专门章节,尤其是62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所占的篇幅更多,几位工农兵作家,每人还设以专节介绍。显然,这种安排设置与当时文学史家对工农兵的政治地位、工农群众文艺水平程度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文艺内涵的想象有关。但在99版《中国当代文学》中,基于上述的叙史理念,也是出于对政治化和阶级论体制下生产的、美学要素比较单薄的“工农兵文本”的抵触,有关工农兵作家作品的相关内容悉被删去。

以上讲的是基于“审美”的当代文学史修改,那么立足于“文化”的版本修改呢,它是否也同样存在有限性问题呢?从90年代实践来看,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洪子诚07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99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子诚曾明确提出了“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洪子诚,“中国”“前言”V)的编写原则;并在叙述思路上一反传统做法,纵横捭阖而又严丝合缝地将作家组织与时代转换、作家身份与经济收入、文学批评与批判运动、读者与书报关系等囊括于笔端,纳入文学与政治“一体化”之中进行观照把握,显示了对文学史的独到而又老辣的识见,而备受学界广泛好评。这些年来,也许受文化批评的影响,洪子诚在新版修订时又再次对此作了强化。这主要表现在对下编第十六章的修改,将其原有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开放时期的外来影响”、“作家的分化与重组”、“文学与‘市场经济’”四节,调整和充实为“‘转折’与文学‘新时期’”、“体制的修复和重建”、“文学规范制度的调整”、“80年代的作家构成”、“文学著译的出版”五节,从内容到叙述都表现了由政治解放下的文学思想解放向转型期文学

规范、文学体制重构的趋势。而对文学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外部研究”问题上,在修订版中也被更为具体的对新时期文学体制运作下期刊类史料的论述取代。此外,修订版第二十五章对“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立足点也与初版不同。后者因写于世纪之交,更关注全球化和市场化给文学带来的冲击,而修订版主要从大众文化的重兴、知识分子的分化等角度阐述当代文学所表现的新特点。

然而,文学史毕竟不是文化史,它更关心与文化息息相关但又更为内在隐秘的精神、情感、思想与心灵。如果从这个角度考察,我们就会感到洪著仍是一种“文化中心”的叙史结构,它在敞开文化体制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将笼罩在体制下的作家作品的丰富复杂的个性遮蔽了。这样,他的回到“历史情境”或曰“历史还原”的考察,所“还原”的往往是外部文学生态和体制及其生成,而不是文学自身的“这一个”与“这一个”文学自身,它也更适合于对文学作文化的、政治的考察。为什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解读十七年文学时殊为精彩,富有成效,而解读新时期文学则多少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为什么此次修改主要集中在离意识形态稍远的下编,而没有在整体思路与叙史结构方面有所调整,原因即此。这也说明了在文化范式下,具体文学形态背后编者自觉的审美追求仍处于与政治文化不断纠葛、无法独立发声的尴尬状态。

说到文化范式的修改,也许不能忘了孟繁华、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它较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似乎更能体现文化范式的优势。洪著尽管在文学史构架中开创地将文学规范、文学制度、文人组织和文学权力纳入视域,但就总体而言更倾向于传统的历史分析,它也以丰富扎实的史料见长。而孟、程合著的这部相对晚出的文学史,则更反映和体现文化范式自身的特质及其现代性的内涵。以二次修改和新增的第十章为例。在初版本中,编者以1976年四五运动至1977年“文革”正式宣告结束展开对文学“解冻”的总体性论述。如果考虑80年代初文学创作仍未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禁区”,这种对文学史的概括应该说是真实的。但这样的描述仍然表达出了一种传统的、断裂性的历史想象,因为不论是四五运动的爆发还是十一大的召开,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政治运动而非文学活动。因此,按照

这样的思维模式,编者的修史实际上又部分地回到了反映论的旧框架。而这一切,在修订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却得到较好的调整与弥补:第一次修改的09版中,它强化了当代文学是如何从“十七年”逐步发展为“新时期”的话语形式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概括和梳理它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二次修改的11版中,还进而在原有历史叙述构架中新增加了“海峡两岸的‘文学战线’”、“文学讲习所”等有关内容,像洪子诚那样,将文学的视域进一步延展到“中国特色”的大文化领域——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充分发挥文化研究的优势:“借助文化研究中对于制度、传媒和话语权力关系等因素的关注,来分析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并以此来构建起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场域”(张涛52),从而与绪论有关“当代文学的发生”的“历史化”描述形成了结构性的呼应。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入的内容使编者的考察从线性的、单维的层面上升到更为开阔立体的高度,并与研究目标的前后历史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可见,这一增补不但构建了对80年代文学图景的立体化想象,而且还为文学史叙述敞开了一个更大的文本。这也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三代学人从另一向度对“重写文学史”所作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有必要指出,文化研究运用于文学史写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与任何范式一样,文学史家需要在历史话语的层层累积上才能逐步实践范式的赓续与构建。更重要的是,尽管对体制和权力的挖掘和阐释是文化研究的强项,但文学史本身的文学审美逻辑仍应占据基本地位,而这又恰好是文化研究的弱势。或者说,提出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纯文学研究对当代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忽略,但这反过来又成为文化范式的一个缺陷:“以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写文学史,就其性质而言,仍是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甚至也可以说,这种新的文学史书写范式,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历史’分析”(张涛52)。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似不宜对孟、程上述修改作过分夸大。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上文提及的新增第十章(它的有关叙述,明显表现出偏向政治文化体制分析而忽略文学本体层面探讨的倾向),而且也反映在11版又增加的茹志鹃的《百合花》介绍:大部分文字脱离作品本身,而代之以有关小说讨论观点的引

述,此时小说分析似乎成为编者进行文化权力阐释的注脚。这里修改动机与修改效果之所以产生错位,原因就在于前者出于审美情怀,它看中了作品本身独特的情感态度所表现出的难得的“缠绵”与“温情”;后者则基于一种范式的判断,它的这种赞肯一俟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又变成了文学与文学秩序之间或正或反的关系的反复陈述。也就是说,史的“结构”规训了史的“解读”,使之形成了难以“通约”的矛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文化研究之于文学史叙述的“有限性”。

三、当代文学史修改中的史料问题及其相关隐忧

前文集中讨论了文学史版本的历时演变,应该说,这种观念上的更迭已成为半个世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来推动当代文学史修订的主要动力。但说到底,当代文学史还是带有浓重“史学”意味的一种研究,它的合法性和创新性最终仍需要建立在大量严谨扎实、真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上,仅仅依靠史观的来回更替很难真正实现当代文学史的实质性的突破。也就是说,促进和决定当代文学史修改的,除了观念之外还有一个史料问题,编者修改是否有效以及有效性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料,史料是版本修改的重要基石。如果说观念进化更多表现在文学史的“重写”而不是修改,那么史料发掘就成为支撑文学史版本修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36)。擅长并且喜欢观念或理论创新的钱理群也说:包括文学史编写在内的研究,“不仅有理论的独立准备,也有史料的独立准备”,而“史料的独立准备”又是“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88)。他们说的史料之对史观乃至对整个历史叙述所产生的根源性影响,完全合乎当代文学史修改及其版本流变的实际。

洪子诚07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05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⑥对“地下文学”的处理和修改,就较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以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本来,在该书初版上编第十五章,洪子诚设置“穆旦最后的诗”和“手抄本小说”二节,重点探讨“文革”期间除公开发表之外

还存在的具有“异端”因素、“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半秘密”状态的另一种作品。因此他对穆旦的诗歌和《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等评价,更多是从与“时代流行文本”的立场出发,强调的是文本所表现的作家“异端”性质的情感和艺术经验。但在修改版中,出于对文学史“系年”和“准确性”的权衡考量^⑦及对作品特殊审美思想价值的强调,他却把穆旦的诗作为“九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归入下编第十八章“诗歌流派的确认”一节中(而不再单独作为一节出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穆旦诗中“对现代知识者心理悲剧的质询与揭示”和“生命的回顾虽近于哀痛,但仍不放弃对于温暖的期待”上面。与之相似,“手抄本小说”被调整到下编第二十章中,对它的评价也更多从“代际”特征出发,关注其中所谓的“历史记忆”。这里之所作这样调整和变动,很重要的就源于“白洋淀诗群”、“潜在诗歌”、“地下小说”等越来越多的“地下文学”相关史料的发掘——如李润霞编选的《潜在写作文丛》对“潜在诗歌”详尽细致的版本考察,李杨对“潜在写作”创作日期与发表日期差位的考察等等;而这些新史料的发掘,它在丰富编者对这一特殊文学历史叙述的同时,也使其逐渐警惕“地下文学”或曰“潜在写作”这个概念本身的含糊性和它可能带来的文学史叙述的新问题。

事实上,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版时也曾考虑过作品时代的问题:“文革期间,还有文革前的那条‘异端’的,秘密的文学线索,这方面的材料,我们只有某些当事人的陈述,这些陈述有时又含糊不清,或有矛盾,没有别的旁证,别的方面的材料来作为印证”(洪子诚,“问题”78)。因为担心编写的文学史因史料“脆弱”而显得“可疑”,只好放弃了当时有关的修史构想(原拟专设一二章,用“文学化石的挖掘”之类的题目来处理这批“地下文学”)。而在修订时,这种“脆弱”而又“可疑”的史料状况有了很大改观,所以才使他对原来想写而没有写的这段特殊文学历史进行了重构。这也表明,文学史修改实际上是编者依据新史料提供的文化密码和固有信息,对已然文学历史所作的一种合历史合逻辑的还原。它不但体现了洪子诚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文学”和“文学史”这两个最基本、却充满矛盾的概念在认知上的嬗变。

而恰恰就在这个关键的环节,我们认为当代文学史修改是存在着隐忧的。至今见到的诸多修改,基本上都是基于“观念创新”的修改,而不是依据“史料发现”的修改。像洪子诚这样可谓凤毛麟角。其中史料史实方面差错,也有不少。^⑧至于文学史叙述,相互抄袭或沿用一些陈旧、不全甚至错误的史料和观点——如对《刘志丹》在80年代再度被禁以及版本修订问题,^⑨对民间刊物与当代文学特别是与当代诗歌生态环境关联问题,^⑩对顾城创作与其杀妻及自缢关系问题等,^⑪也决非绝无仅有。王又平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当代文学史中“还有些史实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被吸收到我们的文学史中去,结果不少当代文学史是陈陈相因,甚至以讹传讹,观点旧,材料也旧”(40)。他所说的,完全合乎当代文学史修改的实际,恰恰暴露了我们在史料方面的“历史性”欠缺。文学史写作为研究的“终点”,它不仅是对研究自身的一次重审——可能是查漏补缺、也可能是系统纠偏,同时也是对自己以外的所有史料和成果的整合性重构。而当代文学史修改,因“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学科属性规约,就更有一个不断吸纳和整合新史料新观点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新史料新观点,除了新涌现的新人新作新思潮外,就是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当代文学编写及其修改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体系,它不但要吸纳与之同构的史料史观,还要吸纳与之异构的史料史观,不但要吸纳位居主流或中心的史料史观,还要吸纳身处民间或边缘的史料史观,不但要吸纳传统纸质的史料史观,还要吸纳图像网络等新媒体的史料史观,不但要吸纳域内的史料史观,还要吸纳域外的史料史观。如此,才能不断打破既有范式的束缚,充分凸现当代文学史的个性和魅力,使其“赓续与建构”呈现一种生命勃发的状态。

以此衡之,当代文学在历史重构与现有新史料及新成果关系方面尽管有所成就,^⑫但总体上讲还处于比较初级阶段,离它应该达到的有效性还有较大的距离。就拿域外史料来说吧,莫言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件轰动文坛的大事,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围绕着其获奖发表了不少文章中,就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其重要原始史料——诺奖颁奖词的忽视。比如有的文章为了说明莫言获奖的合理性合法性,而盛赞诺奖评

奖的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纯粹性”,或摘抄诺奖颁奖词中的某些文学性评语,将其称为是文学“审美性”的一大胜利。这样的推论,至少与诺奖颁奖词的实际不相吻合——实际上,诺奖颁奖词表露了相当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对莫言创作进行了重塑。这与现有的当代文学史、甚至中国革命史的表述逻辑有很大的区别,也与莫言获奖后人们为之欢庆的“获奖理由”存在明显的错位。当然,莫言创作及其获诺奖情况比较复杂,涉及的问题与方面也比较多,需要另作专文探讨。但毫无疑问,强调对包括诺奖颁奖词在内的文学史料(这里姑且将它称为域外史料)的重视,则是应该的,它理当成为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王国维百年前就出色实践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治学“三重互证法”(转引自 陈寅恪 219-20),胡适在七十多年前列举当时“新资料”时,也曾提及“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①域外史料是一个丰富庞大的学术资源,当我们的眼光由一乡一国扩大到天下为一体时,我们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而又不同凡响的创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域外史料和观点将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显得更突出,意义和作用也将更大。对此,我们应该放开眼界,将其作为当代文学学科的新生长点予以关注与引进,并与域内史料和观点相互参证、互渗互融。这也许是当代文学史编写及其修改实现创新和突破的一个路径,是我们今天学人所应抱持的一种开放的、主动的学术态度。

注释 [Notes]

①据许子东统计,截止 2008 年 10 月,中国大陆已经出版当代文学史至少有 72 种。参见王德威、许子东、陈思和:《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4 页。此后陆续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还有不少,如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张志忠主编:《中国当代文学 60 年》,韩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 1979—2008》,陈思和总主编:《中国当代文学 60 年》,张炯主编:《共和国文学 60 年》,杨义、江腊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1949—2009》,吴秀明主编:《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樊星:《中国当代文学》,王万森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新编》,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 1949—2012》等

等,估计总数为 80 多部。这还不包括诗歌史、散文史和戏剧史这样的文体史或专门史。

②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的修改,就属于这种情况。

③《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曾于 1983 年作过修订,但幅度并不大。详见《〈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修订工作会议纪要》,《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1983 年第 4 期。1988 年属再次修改,编写组做出的说明是:“由国家教委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持,于今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了关于本书修订工作的会议。[……]经过几位主编和有关同志协商、讨论,确定这次修改的要点是:一、调整某些过时的提法,使全书在观点和表述方面更加符合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精神;二、注意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提高全书的科学性和理论水平;三、增、删和调整某些章节。”参见郭志刚等主编:《修订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1。

④冯牧曾表示:“我不笼统反对朦胧诗,特别是那种写得比较含蓄,表面上朦胧,实际上并不朦胧的诗[……]这种东西我不赞成。”王庆生、杨文军:“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回顾与展望——王庆生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1 (2013):94-106。

⑤在 1983 年陆续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三册)后,1999 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修订版)》(上下册),2003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011 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经过再次修订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第二版)。

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 年经过增补、修订后重新出版,2010 年编入“学术作品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时依据的是 2007 年版本;此处选用 1999 年版与 2010 年版进行比较。《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 年经过增补、修订后重新出版,2010 年编入“学术作品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时依据的是 2005 年版本;此处选用 1993 年版与 2010 年版进行比较。

⑦即以对现实产生影响的“文学现实”作为确定史料“年代”的标准,而非如初版本那样以作家标注创作时间作为唯一参考。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75-78。

⑧霍俊明的博士论文《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专门对这一问题作了枚举式的探讨,见《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61-121。

⑨1962 年,康生在第八届中全会上,以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名,把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打成了“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毛泽东接受了康生的看法,并做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批示。1979年,这个冤案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纠正。作者后来增补修订的《刘志丹》三卷本也于80年代中期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然而,因新版有关重大史事与历史不符,也与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存在较大分歧,该书出版后引起了社会舆论和许多老干部的强烈不满,于是小说问题再次上升为政治是非问题,并在“昭雪”后二度被禁。参见詹铃:“论《刘志丹》——一部命运坎坷的小说”,《文学评论》1(2007):141-49。

⑩现有文学史大部分只是介绍性地提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民间刊物,且几乎只集中在《今天》上。近年来文学史写作已开始重视对民刊的研究,但从实绩来看,不但考察面较窄且大多只聚焦于朦胧诗,忽略了民刊兴起对当代文学语境所产生的“反馈式”效应的详细论述。大量事实表明,近二十年的中国新诗史基本上是由民间诗歌报刊推动、改写的,离开了这难以数计的民刊,根本就无法谈论这个时段的诗歌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民刊自身已经可以勾勒出一部区别于主流文学、又不断与之形成互动互审关系的中国大陆民间诗歌史,是一种另类的“民间文学”考察样本。参见赵思运、韩金玲:《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梁艳:《暗夜中的潜行者——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一种讨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⑪目前一般都将顾城的杀妻解释为诗人的精神分裂。近几年研究表明,惨案的发生与顾城的诗歌和小说有密切的关联。陈炳良:“从《英儿》看顾城”,《文学自由谈》1(1994):92-94;吴思敬:“《英儿》与顾城之死”,《文艺争鸣》1(1994):34-40;谢冕等:“绝笔的反思——关于顾城和他的《英儿》”,《小说评论》3(1994):73-78;章学珍:“幻想之死——从《英儿》及其诗作看顾城的弃城”,《小说评论》S1(2007):85-87;唐晓渡:“顾城之死”,《当代作家评论》6(2005):19-27。

⑫如金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新增第二部第六章“生命强力的二重奏:东西部诗歌群体”论述“新边塞诗群”、“东海诗群”等一批原来没有进入、或较少被文学史关注的作家,并正式将“台湾、香港、澳门当代文学”作为文学史的整体一部分加以讨论(初版本仅作附录);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在下编第九章“各体文学创作”中新增对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女性作家群的创作”等文学现象的考察,还增补了“2000以来的文学”作为第十章;吴秀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在初版本基础上新引入了“‘80后’小说的另类写作”、“风生水起的网络文学”等具体章节,并以较大幅度增加了对余华、贾平凹、莫言、王朔、王安忆等作家具体作品的评论等等。另外,如朱栋霖

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第三册)及《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0》(精编版)、张炯等主编的打通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中华文学通史》(第八、九、十卷)修订版《中华文学发展史》(近世史),也都有相关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的补充。

⑬这是胡适在1927年给傅斯年信中提到的一篇“略述‘史前’材料”的论文的论点之一,特意指出显然是因为心有所感。参见“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狄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33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Chen, Yinque. *Collected Papers from Jinmingguan Volume I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0.]

冯牧:“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问题——在华中师院《中国当代文学》教材审稿会上的讲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6(1982):44-56。

[Feng, Mu. “Problems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6 (1982): 44-56.]

——:《文学十年风雨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年。

[———. *Ten Years in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89.]

郭志刚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Guo, Zhigang, et al, eds. *The Initial Draft of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 et al, eds. *The Initial Draft of A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8.]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Hong, Zicheng.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下转第76页)